

# 棕榈树

“导航到某某超市,往东50米,路口见某某驾校,往北百米,到村口左转,看见两棵棕榈树即为我家。”

离开职场后,我宅居江南故乡的日子越来越长。每在故乡时,常有远道而来的异乡朋友以及本地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酒喝茶聊天。我在把定位发给朋友后,总是要补充上这样一句话。毕竟,我家僻居乡下,交通不便,甚至,地图上也没有我家所在的村子,要是单纯按导航,很可能会在附近兜圈子。

我出生的西朱这个村子,如今这个时代,百度地图都不载,颇配苏东坡“新酿桂酒”中说的那种“蛮村”,“风流可惜在蛮村”——我们西朱东西两村,多姓朱,号称晦庵嫡裔,耕读传家,出过不少读书人,最有名的是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朱德生先生。

我家门口有两棵棕榈树,一公一母,原来在我家储物暨谷仓前,如今储物谷仓改建成了我的书房。它们就像门神一样,高大挺拔,剑指苍穹,守在我书房窗前,远远可见,成了我家最有名的地标植物。甚至有一年,我从湖塘打专车回家,司机看了看当时胡子拉碴浑身颓废气象的我,问我是不是到书法协会去,我笑着否认。离电子地图上定位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司机突然问我,是不是要到那个村上有两棵棕榈树的地方去?我一愣,问司机送过我吗?司机摇摇头,说送过从火车站接的外地客人,到这个村子有棕榈树的人家。我哈哈大笑。还真是我家。

“叶似新蒲绿,身如乱锦缠。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唐·徐仲雅,《咏棕榈》)

故乡很少棕榈树,但故乡老一辈人都熟悉棕榈床大蒲扇,那都是棕榈树的产物,也因此,我也知道棕榈树。我一直的刻板印象是,棕榈是热带植物,细沙、吊床、躺椅和棕榈才般配。后来才知道,棕榈树是常绿乔木,原产中国。棕榈在中国种植面积非常广,除西藏外秦岭以南地区都有栽种。但是,在江南乡村,现在其实很少见。一如到我家,无论本地的还是异乡的朋友,都会好奇,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两棵高大的棕榈树。

好奇是因为江南少见棕榈树,而少见,无非就是因为棕榈对于农家而言就是无用之物。早年除了富贵人家,以及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种树专业户,江南乡村的植物,早年多以有用为要,要么是本地名木,可以打床打凳子做椅条椽子,要么是杂树可以当柴火。棕榈树虽然可以做棕榈床大蒲扇,却非本乡特产,祖父生前虽然擅用稻草篾片编枕(搁在铁锅和锅盖之间漏气的器物)挣些小钱,我却无印象他编穿过棕棚、蒲扇。

尽管熟悉我的朋友们都惊讶于我对往事细节的记忆,但关于我家这两棵高大的棕榈树的栽种,我的记忆则一片空白。我很晚才留意到家里的两棵棕榈树。

我后来问父母何时为何栽种棕榈树。父亲说,就是种着“白相相”。但我印象中的父亲,却并非那种种树只为“白相相”的人,当年他的脑子里就是挣钱养家,农忙之余仍忙着拾荒卖蛇卖冰棍摸甲鱼打鱼卖菜挣钱,如今面临拆迁,他仍然天天坐在院子里把他早年搜罗的如今已经没有用了的电线剥掉塑料抽出里边的金属线卖钱。但确实没找到其他理由。父亲辛劳一生难得的心血来潮的“白相相”之举,在大门口的晒场边种下的两棵棕榈树,后来却成了西朱西的一道风景,以后也会永存于他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的文字和记忆中。

我家的两棵棕榈树,母亲记得是我

弟弟12岁时种的。父亲说不对,是弟弟16岁时种的。父亲回忆,弟弟已经当学徒了,是父亲从后村张家塘张菊生家挖回来种的。

我后来选择采信父亲的说法。他老人家提供了更多信息:提到了弟弟已经当学徒;提到了张家塘张菊生家,我记得当年张菊生家房子后面有个院子,有好多树苗。

弟弟16岁那年(故乡多说虚岁,16岁即15周岁),其实也是我人生的转折之年。那一年是1985年。弟弟从政平中学初中毕业,进了前黄的乡办厂当了学徒,开始了车钳刨的人生;我从前黄中学高中毕业,洗脚进城,去了北京,上人民大学,开始了新时代范进的人生。就在父亲种下两棵棕榈树的那一年,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一年走向了不同的世界。

照理,这一年栽种的棕榈树,我应该记得;而且,那年我上大学,应该是家里最大的事了,但父亲聊起往事,与种树连在一起的记忆,却是弟弟的年纪和学徒事。显然,种棕榈树这事,跟我关系不大,尽管它们现在就在我的书房窗前。我后来努力去圆自己的想象。我想,我上大学就像范进中举,吃了皇粮,成了官家人,父亲可能有意无意选择了让我与乡家人的日常切割,有点类似胡屠户“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况味。

父亲难得的“白相相”,家门口多了两棵棕榈树。如今,这两棵棕榈树,从小苗长成了三层楼高,在乡村也算鹤立鸡群了。也许周边村子也会有棕榈树,但像我这么高的,家里人也未听说过。

除了一次村里办丧事,烧纸钱时,燃着的纸钱随风飘到我家一棵棕榈树上,烧着了树干上的丝毛,救火的时候,爬上梯子用水龙头喷才扑灭,烧掉好多棕毛,有点黑乎乎光秃秃之外,父亲和弟弟从未给两棵棕榈树修剪过,而是任它们自然生长。

棕榈树大概生命力也很顽强。那次火烧,即使烧过的痕迹过了几年还依稀可见,但被烧的棕榈树依然生机勃勃;即使面对寒流,两棵棕榈树间的已经每年结果的芭蕉都冻死了,棕榈树却一如既往,甚至,很少在这么高地方做窝的麻雀,前两年都在棕榈树上筑巢了。

我家的棕榈树,无论是在弟弟12岁还是16岁时种的,已经在那个电子地图上并不显示存在的村子,招摇于阳光雨露雪中40年左右了。度娘说,棕榈树的经济寿命大约是20-30年,自然寿命有一百多年。杜甫曾有《枯棕》,写棕榈树因有用而枯萎: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沈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啼,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藿。”

庄子的山水不以材而得终其天年。我家的棕榈,本也无杜甫枯棕之有用之厄,可享其天年。如今却因工业化的无序无情推进,恐怕就会“摧残没藜藿”了。

“梦见一株棕榈,在遥远的东方,火灼的悬崖边上,独自地默默忧伤……”

在推土机到来之前,我家的棕榈树依然挺拔。它们知道了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能悲伤而拙劣地摹仿德国大诗人海涅的《北国有一棵松树》,为它们祈祷。

# 家乡的萝卜干

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每到腌菜腌肉的季节,总是让我想起童年时代,家乡腌咸菜萝卜干的情景。

家乡腌制的萝卜干远近闻名。每年到小雪季节,在老家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腌制萝卜干的习俗。家乡腌制的五香萝卜干,香脆爽口,特别下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孕育出家乡的土特产来。常州处于鱼米之乡的江南,特别是城郊农村,更是水清土肥,很适合萝卜蔬菜的种植。而在常州西郊的新闻,那里的萝卜干红皮白心,水分充足,鲜嫩可口,可当水果生吃,还可做菜,更适宜来腌制萝卜干。每年七月,当地菜农收完大豆,就开始耕土翻地,撒上优良品种的萝卜种子,待萝卜苗发芽后,要把过密和多余的苗拔去,留出萝卜生长的空间,这道工序一般要进行两三次。之后是除草、施肥、勤浇水。听新闻当地的菜农讲,给萝卜施肥,不能施化肥,施的是农家基肥冲水粪,这样种出来的萝卜才嫩可口好吃。

每年到十一月下旬,萝卜长大成熟,就可以收获了。小时候,我看到大人们先把萝卜拔起装筐运回家,去掉缨叶和根茎,清洗干净后晾干,再切成薄片后置

于盐水中浸泡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把萝卜薄片放到晒场上,用芦席或竹篾笆盖晾晒,一两天后水分蒸发,就可以腌制加工了。大人们把晒得半干的萝卜薄片放入木盆或竹匾里,撒上粗盐粒,在搓板上反复揉搓,使其入味。再将八角小茴香放入拌匀,喷上少许白酒,放进瓷罐瓮头里。瓮头口处还要用稻草塞紧,放一两天后,把装满萝卜干的瓮头反扣于叠盆中,叠盆中要加满水,这样起到隔水密封的作用。大约过二十天左右,就可开瓮食用。此时腌制不久的萝卜干甜嫩香脆,特别爽口。自家腌制一瓮萝卜干一般一家人可吃上大半年。

腌制的萝卜干除了自家吃外,还可以当土特产送亲人送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萝卜干腌制好后,我家上海的亲戚都要打电话来,叫我们务必寄上萝卜干给他们尝尝。

如今,常州的萝卜干,不光是江苏地区名特产榜上有名,而且已名扬天下,畅销全国。前几年我乘坐飞机,没想到在飞机餐里还有一小袋常州萝卜干。目前许多超市和网店都有瓶装和袋装的常州萝卜干,据说很受食客们的欢迎。

小小的萝卜干,难忘的家乡味,更温馨着我童年美好的回忆。

# 意大利普拉托市有条“常州”路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普拉托市(Prato)是常州市缔结的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

1982年,《光明日报》驻意大利记者万子美访问普拉托市,会见了该市的市长和文化局长。市长提出了希望与中国一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愿望。万子美记者回到罗马后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做了汇报。大使馆做了杨清华分管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杨公使系我党第一代女县长,后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籍籍江苏常州武进。她考虑到普拉托市是意大利重要纺织基地之一,常州也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于世,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真是“门当户对”,于是她向意方和国内推荐了常州。同年12月,我驻意大利大使张越离任回国赴普拉托市考察辞行,该市市长正式表达了希望与常州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愿望。之后,江苏省副省长柳林访问普拉托市,市长又一次提及与常州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意向。

1983年7月,意大利摄影家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常州是代表团指名要访问的城市。在常州期间,意大利摄影出版社负责人塔尼先生,会见了常州市外事办公室负责人樊之瑞,赠送了普拉托市的介绍资料。普拉托市是一个具有典型欧洲古典建筑的古老而文明的城市,人口18万,距欧洲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只有16公里,毛纺业非常发达,是意大利三大毛纺基地之一。

众所周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8月份,我到昆明参加中国档案学会的年度系列活动,终于一遂夙愿:走进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了博物馆,并且到云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丰富的档案史料,近距离感受这座仅存在8年的临时大学,在国破家亡之际所留下的历史足音与苦难辉煌,以及其中活跃着的不少常州人的身影。

华罗庚刚刚跨进清华园的时候,就认识了闻一多先生,他对闻先生的文学才能十分敬仰。他最喜欢读闻先生的诗《死水》《心跳》。这时,闻先生对华罗庚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惊人的成就也很敬佩。由于两人主攻专业的不同,当时很少接触。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华罗庚爱国心切,放弃了在剑桥大学的学习,从英国伦敦回国,到了昆明便受聘于西南联大,28岁的他任数学系教授,留下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

在昆明期间,闻一多一家居住的陈家营房子是四合院结构,共有两层楼。楼上住人,楼下则是厨房、堆放杂物和饲养牲口的地方,闻家8口人就住在楼上的两间房里。当时,华罗庚一家居住在黄土坡村。一次空袭中,敌机把他家躲藏的防空洞炸垮了,华罗庚被埋在炸塌的防空洞里,耳朵也震出血。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刨出来。死里逃生后,华罗庚一家为了安全,决定赶快搬家,但一时间找不到房子。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同居,还主动把比较大的正房腾出一间给华家住。闻一多租住的房屋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

华家搬来后,闻家将所住的正房一分为二,东侧由华罗庚及夫人住,西侧则住闻一多及夫人。由于中间没隔墙,两家在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两家的子女统一住在东厢房,相处得像一家人。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华罗庚曾写了《挂布》诗,记述当时的情景:

挂布分屋共窗扉,



鲁卡利尼市长(左一)给我赠送纪念品,右一是普市意大利语翻译。

1983年,常州市政府通过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两市缔结友好城市的申请报告。1984年6月12日,国务院下达了同意常州市与普拉托市缔结友好城市的批复。

1986年6月,应常州市市长陈鸿昌的邀请,由市长亚历桑德罗·鲁卡利尼为团长、副市长尼格诺·吉昂罗为副团长的普拉托市政府代表团及经济企业界人士一行20人访问常州。6月6日两市正式签订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

1987年6月23日至7月7日,应普拉托市政府邀请,由常州市委副书记程九度和章化农率领的常州市友好

代表团一行6人和经济考察团一行4人对普拉托市进行回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于愉清、市外事办副主任朱则先和我陪同出访,我系双方参访项目联络员兼翻译。常州市友好代表团受到了普拉托市政府、议会和人民的热情款待。其间,在普拉托市政厅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并商定了友好合作项目。当晚,普拉托市政府和议会举行盛大的欢迎和庆祝晚宴。常州市代表团还参观了羊毛再生工厂、银行画廊和学校。我们还应邀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家做客。鲁卡利尼市长是一位

意共党员,他深深地热爱这座城市,也深深地热爱这里的人民。他在普拉托

# 华罗庚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时的华罗庚一家。多、华罗庚两家曾同住一室。



昆明西北郊(现五华区)陈家营,闻一多、华罗庚两家曾同住一室。

岂止两家同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华罗庚一家6口人,闻一多一家8口人,两家14口人在陈家营度过了隔

帘而居的一段生活,一直到1941年10月,闻一多一家搬迁至司家营。华罗庚埋头搞数学,闻一多埋头搞考古,两位教授清贫自甘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华罗庚刻苦钻研数学,夜里灯光如豆,工作到很晚,终于完成了震惊中外数学界的新著《堆垒素数论》。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闻一多积极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去,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闻一多的正义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华罗庚,使华罗庚对当时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

由于战时物价飞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十分艰苦,为了养活8口之家,缓解生活压力,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来增加收入。其间,闻一多精心刻了一枚图章赠送给华罗庚,上面写道:“甲申岁宴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陪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俭,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60余字,幽默风趣,以谐写庄,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表达了闻一多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

闻一多送给华罗庚的这方印章及其边款铭文,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忘怀。这枚印章现在存放在他金坛家乡的华罗庚纪念馆内。

1946年秋天,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讲学。他踏上了新的征途,坐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翻开报纸,突然看到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眼前浮现一片漆黑,气愤地流下了眼泪。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离开昆明不久,继李公朴被暗杀之后,闻一多又惨遭毒手,这是什么世道啊!他怀念战友,憎恨国民党反动派,心里交织着强烈的爱憎,在车中口占一绝《哭一多》:

乌云低垂泪满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读完这段往事,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当年联大教授生活的艰辛,也感动于两位教授之间真挚的深情厚谊。

我们在CERNOTI路上合影,右一是作者本人,右四是程九度副书记,右六是章化农副书记。